

抗戰基地縱橫談

·樂恕人（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教授）

英雄豪傑稱霸之區

八年抗日戰爭的基地四川，古來有「天府之國」的美名；論面積之大，人口之多，比之亞洲的日本、歐洲的法國，不相上下。再說物產的豐饒，却較日本、法國還有過之。

講形勢，四圍崇山峻嶺，中間交錯着平原和丘陵地帶。長江自西而東，橫貫南部；嘉、岷、沱、澗四大河流又自北而南，縱貫全境。水路縱橫，大小陸路又密佈如蛛網。

從戰國時代到秦漢，到唐宋，到元明清，這塊土地就被帝王將相、英雄豪傑爭相據用，演出歷史上許多幕壯烈的戲劇。這兩千多年的治亂興亡，內憂外患，簡直就是中國的一幅縮影，一個代表地區。

遠的史乘不及細述，祇以我少年時期記憶說起，四川十足表示出「天下未亂蜀先亂，天下已治蜀未治」的局面。

國民革命在北伐成功以後，四川表面服從中央，軍政統一。而事實上四川軍頭，羣雄割據，戰禍不息，雖然地大物博人衆，但是民生困厄，

建設落後，實在出乎想像之外。

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，四川大小軍頭林立。名義上他們是國民革命軍某某軍長，以及什麼督辦、省主席之類的名位，服從了中央；但事實上，擁兵自重，各不相讓。對於中央政令，陽奉陰違，在自己統治的地盤上，各自爲權爲利，胡作妄爲。中央政府形式上統一了中國，而面對着的局面是：外則列強壓境，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野心和行動，更形暴露；內部又爲了共產黨的興兵作亂，逐漸猖獗；因之對各地軍頭的割據，採取了懷柔政策，封疆列土，希望他們在中央領導下，共同來建國，共同去抵抗外來的侵略。

四川軍頭們就在這種大局之下，「天高皇帝遠，猴子充霸王」，你爭我奪，戰伐不休。

寧漢分裂時期，四川軍頭們也順着有過短暫的分裂，劉文輝、鄧錫侯等擁汪精衛，劉湘、楊森等則擁戴蔣中正。國民政府統一安定後，四川軍頭們也順着平靜了下去，全都歸順了在南京的中央政府。

但是，四川的割據局面還是照常存在着。

姪兒與兵攻打公叔

民國二十年前後劉文輝的第二十四軍霸佔着四川西南大部分，田頌堯的第二十九軍佔四川正北，鄧錫侯的第二十八軍佔川北偏中，劉湘的第二十一軍佔四川中東大部，楊森的第二十軍佔川東，其他還有獨立的師長如羅澤洲、李家鈺等，則在各軍之間的夾縫地帶分據幾縣十幾縣。當年四川的寧屬雅屬還未劃撥給西康建省時，全川一共有百四十七縣，有七千多萬人，各軍各師，有的是地盤存在着。

民國二十三年在江西的「紅軍」突圍西竄時期，四川的省主席已由劉湘取劉文輝而代之，其間經過一場侄兒劉湘與兵的川東聯軍西征打敗公叔劉文輝的內戰；結果在二十四年初劉湘經中央明令發表爲四川省主席，劉文輝則屈就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長。那時正遇上紅軍過境，從川康邊界掠過，其中徐向前、賀龍兩部還短期盤據川北的通南巴一帶，威脅成都，震動重慶。

劉湘和各部軍頭的部隊，並不能協力抵禦赤潮，不得已敦請中央派兵入川，驅除境內的紅軍

中央先派賀國光率領軍委會參謀團到重慶，隨着又派康澤的別動總隊所屬第一二三大隊入川，更由中央軍隊協防川省，掃蕩川北徐向前、賀龍兩部的「蘇區」，才把川省的危局安定下去，也才把川省直接置於中央勢力統治之下。可是四川老百姓的災難並沒有立即解除，祇是心理上較為安定，以為從此「中央」來了，一切可望好轉，民生可以改善。

那些年月裏，在軍頭們的割據統治下，老百姓每年對「軍政府」所繳納的田糧，早已預收到民國好幾十年，而其他苛捐雜稅，名目繁多，層出不窮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真覺得四川太富了。以軍頭們那樣的窮搜濫刮，而老百姓仍然度着小康的局面。四川農地的大小地主不用說豐衣足食，就連自耕農和佃農，也無不衣著充足，一年到頭，每日三餐白米乾飯。最窮苦的區域僅川北一小部分，要吃雜糧和小米合煮的稀飯。但是由天災造成的饑荒，可以說是從來沒有過。只是人禍相連，不大不小的內戰和征糧抽稅，老是糾纏着老百姓，永不得安息。

軍頭們搜刮的民脂民膏，大部用來培植軍隊，藉以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；另一部則用來置產業，蓄財富。四川省最大的地主，就是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。他的田產在川西南富庶之區，地連千里；他的房產在成都和其他大小縣內，也是鱗次櫛比。

至於說對統治區內的建設，或是對民生有利有益的事，祇有楊森和劉湘在成都當政的時候，

還略有表現。但是，說來怪可憐，也太可嘆，從民國初年到抗戰爆發前的二十五年歲月中，除了有少數地區建設了點公路、公園、馬路、圖書館、醫院、電燈之外，全四川竟沒有一條鐵道，省會成都竟沒有自來水和電話。

在另一方面，四川老百姓除了繳納重重的賦稅以外，各地治安不寧，土匪出沒；一遇上內戰爆發，散匪變成股匪，人民就在軍和匪的擾亂中過着驚恐的生活。同時，四川民風雖然淳樸，但是愚昧、落伍；最主要是鴉片煙流行，川人健康的不良，社會的黑暗加深，大煙正是主要的毒害之一。自然，中央勢力入川以後，各方面逐漸有了改善。田賦稍形減輕，大煙嚴格取締，軍隊開始整編。治安有了防範，四川老百姓似乎吐了一口長氣，盼望着好運道降臨。

帝國主義交相侵略

還不用歷數全川的內戰頻仍，民生不安，即以省會成都而言，抗戰前的局面也實在太不像樣。省會是全川首善之區，有七十萬人口，是中國歷史上的名城，而且還是若干代偏安割據的國度的首都。那最壞的十幾年中，全成都竟由劉文輝、鄧錫侯和田頌堯共同佔據；由劉的部隊佔據西南城廂，鄧的部隊佔據東城，田的部隊佔據北城。城區內竟成三分天下，兵士們常常殺人越貨，或是械鬥，各有各的勢力範圍；市民向各軍照樣交稅服役，各事其一主。後來成都治安太壞，民怨沸騰，三軍長才協議組織「三軍聯合辦事處」，由劉文輝的副軍長向傳義（字育仁）出任辦

事處長，組織聯合巡查隊，日夜遊遊市區。向傳義處長殺人不眨眼，鐵面無私，亂兵盜匪從此消聲斂跡，成都市內才恢復了安寧。

四川自然也犯着中國全國所患的民族病。比較說來，四川人所患的貧和愚兩大民族病症，後者重於前者。軍頭們的統治下，對於民生疾苦已經不在他們重視之中；對於教育問題，更不在乎。受教育的比例極小，文盲太多。

以一個七千多萬人口的省區，僅在成都、重慶有三所大學，在成都的四川大學，和在重慶的重慶大學，原係省立，後期改成國立大學。在成都的華西大學則是美英教會所辦。其他專門學校在成都雖有設立，大體說來都不夠充實和進步。中學小學選比較普遍，但連小學都不是義務教育，許多農家子弟，頂多進過小學，連初中都無力升學。而一般比較富有的自耕農和地主的子弟，有力量升學也不入學，仗着田地可以生活，竟對受教育視為不必要。這是民間的陋習，而軍頭們竟也不聞不問。因此，四川七千萬人口中，不知有多少文盲，也不知有多少未曾受過現代教育。這是小貧大愚的最顯明的現象，四川人並不因生長在「天府之國」而倖免。

重慶的繁榮，除了它的地理條件外，還有不得不指出的特殊由來，即是帝國主義侵略下添給它的重要性。本來，重慶深居內陸幾千里，如果國家正常，它本可以安然無恙；無奈清末積弱，遭遇各帝國主義的侵略，歷次抵抗外國作戰失敗，在好幾次不平等條約下，重慶最後也成了列強侵略的中心地帶之一。

公元一八四二年（清道光二十二年）中國因鴉片戰爭失敗，和英國簽訂的江寧條約，應為第一次所簽訂的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。當年的五口通商還祇限於沿海口岸。

到了一八五八年（咸豐八年）清廷同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後，長江下游的口岸遂被迫開放，列強有內河航行權，軍艦商船長驅直入，門戶洞開，不但早無海防，更進而連江防也喪失了。

再到一八九五年清廷與日本因對朝鮮問題作戰而引起的「甲午戰爭」失敗，在日本簽訂馬關條約，開放沙市、重慶等地為商埠後，長江上游也變成了列強的侵略站。重慶，乃至整個四川，就直接在列強軍事和經濟勢力的威脅下。

從此，重慶設立了英、法、日各國的領事館，各國不但商船可以自長江上溯重慶，而且軍艦也開到重慶江中。於是，重慶不幸而變成國際性的商埠，也變相地增加了它的繁榮。

重慶就像一個半島，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的合流處，三面環水，一面有金碧山雄據在上，地形險要。四川人說：「天生重慶，鐵打瀘州。」足見重慶自古不凡。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雖在成都，但經濟中心却在重慶。四川所產的桐油、豬鬃、藥材、綢緞、榨菜、皮毛等商品，全滙集在重慶裝輪，從長江運往川外。甚至陝、甘、滇、黔的某些貨物，也有先運經重慶再運出川的。自然，從外國和外省運銷西南的貨物，幾乎全部由長江口岸上溯長江，運到重慶，再分銷全川及隣川各省。

因此，重慶事實上是中國西南最大進出口商

埠，市廛繁華，工商興盛。四川人早就叫它是「小上海」了。

地靈人傑沾上洋氣

重慶不但經濟繁榮，而且形勢險要，山水壯麗。嘉陵蜿蜒，長江奔放，南山巍峨綿互，市區層次特立，真正顯得山高水長，氣象萬千。

但在抗戰以前，四川本省人，特別是川西成都一帶的人，却嫌重慶俗氣，有一首花鼓民歌嘲笑它道：「一進重慶城，山高路不平；口吃兩江水，笑貧不笑淫。」因為它是商埠，酒色爭逐特別盛行，所以風氣不太淳良。

可是，重慶雖然俗氣，已經沾染了上海、漢口一帶的「洋氣」和「海派」，但重慶仍不失地靈而人傑。

遠的史乘不去講，就從民國前後說起，有些傑出人物，不能不在此軫懷崇仰。

第一個了不起的人傑，應該數辛亥革命前的鄒容。他以十九歲的少年，奔走革命，活躍日本和上海一帶。他所著的「革命軍」二萬多字長歌，正氣磅礴，深入淺出，成為開創新時代的先聲。國學泰斗革命先進的章太炎為他的「革命軍」作序，並在其所辦的蘇報上發表、宣傳。後來清廷震懾，竟在上海英租界控告章太炎的蘇報，逮捕太炎先生，鄒容慷慨投案，不願牽累蘇報。鄒容與太炎先生同時入獄，鄒容竟因被虐待而病死獄中，才不過二十一歲。

孫中山先生在南洋鼓吹領導革命，就印製了「革命軍」幾萬冊，到處分散給華僑，南洋一帶

才播種了民族革命、民權革命的排滿思想。

民國建立，臨時政府封贈鄒容為大將軍，設壇招魂，大總統孫文還親往拜祭。

此外，如對辛亥革命、討袁之役有過大貢獻的革命黨人，出身重慶的有：曾任四川省議會議長、行憲政府大法官的李肇甫（伯申），具俠士風誼的革命黨領袖之一的朱之洪（叔凝），贊助國父孫中山排滿倒袁的健將石青陽、楊庶堪，革命黨人又兼學者的向楚（仙樵）、任鴻雋（叔永）等等。

「地靈人傑」，觀於巴縣，至今令人景仰。抗日戰爭前幾年的重慶，因為水道交通直達京滬，工商繁榮，成為西南最大的內陸商埠，所以在地方建設上，也比其他城市略較進步。市區大分為上半城和下半城兩部，大街通衢，早已修築了三合土的馬路，有電燈、自來水、電話等現代化都市的起碼條件。

在抗戰爆發前的幾年，以重慶為基地，川人中出現了一位大實業家盧作孚，值得記上一頁。原來，長江航業界在列強的宰割中，形成英、法和日本的世界。英國勢力最早最大，有太古、怡和等各家公司的輪船，法國有聚福公司，義大利有義華公司，日本有日清公司、日本郵船株式會社；而中國只有「招商局」勉強維持自己的長江航運，但其勢力幾乎不能和列強任何一國相比。到了民國二十年前後，四川出了一位實業家盧作孚先生，他約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純粹以民間資本，創辦了「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」，主要是航運，其次是紡織廠。

民生航運一枝獨秀

關於航運事業，最初只有幾隻小輪船，航行四川境內的長江沿岸。因為盧作孚本人和同事們清廉苦幹，經營現代化，所以業務蒸蒸日上，慢慢由川江而發展出川，最後竟擁有大小輪船數千艘，其業務由上海而及全長江以達川南的宜賓，也就是金沙江開始改稱長江的最上游。

民生公司的聲譽日隆，其對貨運的準確妥善，對客運的親切週到，愈發增加了業務，浸浸然在長江中外航運界中，大有後來居上之勢。

民生公司的崛起，還有一項重要的因素。當年國家正面臨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，一般國人的愛國心非常激動，排外情緒極其濃厚。

民國二十年「九一八」，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東北三省，建立偽滿洲帝國後，又接着向華北進逼，局勢一天比一天嚴重。國內則江西剿共戰事規模漸大，最後紅軍突圍，由西南竄擾到西北，十幾省動盪不寧。

在內憂外患極為嚴重的局勢下，中央政府雖然勵精圖治，以「安內攘外」為最高國策，一面剿共，一面建設；但中央的政令事實上不能貫徹到全國，若干省區軍頭割據，且有此起彼伏，不大不小的地方性內戰。因此，一般國人，看到國家的危急，特別是對侵略迫害最烈的日本帝國主義，仇恨和抗拒的意志特別強烈，情緒特別高漲。

因之，以學校及民衆團體為首，掀起極度熾烈的愛國運動，其中最具體的表現即在要求抵抗

日本的侵略，由各種排日運動為開始，進而要求政府抗日作戰為最後目的。

長江中日航運成爲民衆排日的目的之一，一般人都不願乘坐日本的商輪，不願由日本商輪運貨；同時，更爲了廣泛地排外，對英法在長江中的航運，也有過稍遜於日本的抵制。在這種情勢之下，民生公司以本國民間的航運興起，以經營有方使業務日隆，所以在愛國心和本身優秀的雙重條件下，成爲中國實業界的新星，成爲長江航運界的國寶。

七千萬人卅四份報

介紹起抗戰前的四川，不能不詳爲記出有關文教中最重要的一環新聞事業。

關於四川當年的新聞事業，坊間有關書刊，記載頗少，不妨加以追述，也可以看出抗戰基地的四川省區，在戰前的新聞事業的歷程。

四川佔有三十萬多方公里的面積，那時代號稱有人口七千萬，物產豐富，是中國地大物博人多的代表省區。從周秦以迄漢唐，四川就是一個不平凡的地方；其中早就形成東部的巴郡，和西部的蜀郡爲中心地帶。唐朝置東西兩川節度使，從此又有兩川之稱。到了民國，雖然省治在成都，成爲政治文化中心，但經濟中心却在重慶。不但民間事業有許多川東、東川、川西、四川的名稱，即連國營郵政，也在成都和重慶分設西川和東川郵政總局。

文化事業方面，國立四川大學、私立華西大學，以及其他專門學校、中學雖設在成都，但重

慶也有省立重慶大學（抗戰前二年方改爲國立）和其他專門學校以及中學等等。

至於新聞事業，也不例外，多集中在成都和重慶兩地。其他一等縣治如萬縣、宜賓、樂山、內江、合川等處，雖有報紙，但有的並非日報，有的雖出日報而內容簡陋，有的甚至是用石印或油印，所以不必提出，僅以成渝兩處的新聞事業作爲川省的代表性報業，略爲述說一些史實。

在抗戰前三年，也就是我出川前二年，成都的報紙也有相當可觀的進步。

資格最老的要算李澄波先生主持的國民公報，日出兩大張；但編排和紙張印刷等條件，過於陳舊，字體用的是舊四號正文，有些文旁還有圈點。這家老報在抗戰後，由川籍金融界聞人康心之如昆仲投資接辦，聘請川籍老黨人曾通一（道）出任社長，並遷在重慶出版，才有了嶄新的改革，竟然在八年抗日戰爭中，與集中在重慶的各大報並肩作戰。

國民公報當年在成都過於老大，所以在民國二十年前後，就爲後起之秀的新新新聞取其領導地位而代之。新新新聞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鄧錫侯有關係的人士所創辦，社長是馬秀峯，總經理是陳斯孝，總編輯是劉啓明。該報最初出版四開二張，後來擴充爲四張，對版面的新穎、消息的充實、廣告發行的加強等等，盡了不少力量。特別注意全川地方消息和副刊等，在那時候，可算全川最新式、銷售量最大的報紙。

民國二十三年，四川經過一場大內戰，以川東的第二十一軍長劉湘爲首，組成「聯軍」，打

敗了川西的第二十四軍長劉文輝。後經中央發表劉湘爲四川省主席，前主席劉文輝則退居西康省建省委員會委員長。二劉同爲大邑縣人，劉文輝是劉湘的公叔，因之四川人戲謂姪兒子打公叔叔，大鬧家務事。劉湘當了省主席，省政府改組，設立編譯室，其任務有類現在臺灣省政府的新聞處。川省府編譯室首任主任，是成都名士舒君實。旋即由他創辦華西日報，作爲省府的機關報，比起劉文輝主持省政府時只知敵視報界的作法，却有了進步。華西日報出版對開兩張，在業務上以新新聞爲競爭的對象，形成成都兩大日報對峙的局面。

其他還有川報，由宋師度主持；新四川日報，由張聖奘主辦；另外有幾家，已不復記憶了。重慶方面，以周欽嶽爲總經理的新蜀報，以高允斌爲社長的商務日報，好像是最大的兩家日報。他們在抗戰八年當中，與從成都遷去的國民公報，同爲三家四川原有的報紙；和中央、大公報、掃蕩、新民、時事等自川外遷渝的大報共同奮鬥，並未受到競爭打擊，甚至被淘汰的地步。

四川新聞事業，據調查在抗戰前，共有三十多家報紙，以成都最多，重慶次之，其他一等等縣又次之。在經營方面，幾家大報如成都的新新新聞、華西日報，重慶的新蜀報和商務日報等，他們有的可以維持，有的甚至還有盈餘。說到銷數，以新新聞爲例，它暢銷成都和川西南及川中一部，但也不過萬餘份，其他是幾千份。

擺龍門陣泡茶賃報

當年四川報紙，如以七千萬人口計算，報紙的銷數，其比例的低落出人意外。不過，那一時代，那一環境，却只能有這些微成績。因爲四川一如中國其他省區，教育不發達，文盲太多，能够讀報的限於知識份子和工商界上層人物，以及地方上的士紳、學校師生之類，還不能普及到一般民衆。及到抗戰爆發前後，一般小市民也才有了每天看報的習慣。

另外，一般人沒有訂報的習慣，各報館在自巳的門首和通衢、公園等地方，照例貼報，供應市民閱讀。再其次，四川各地茶館之多，恐怕全國第一；而茶館之中，預備有各種報紙，供給茶客賃讀。

像成都最有名的少城公園，樹蔭濃得像帳幕，溪流映帶，池塘點綴。其間茶館林立，竹椅木桌，有的在室內，有的是露天。從早到晚，不但可以喝茶而且還可以吃麵點。早上或晚間，還可以在茶肆洗面洗脚，泡上一天也不成問題。茶客們一坐下，叫過「拿茶來」，接着就叫「拿報來」，同時可以租看好幾份，付出的費用極爲有限。

有了以上那些原因，報紙的銷數少得太可憐，實在不足爲怪了。

至於廣告，商業性的廣告還是佔極少篇幅，大多是政府或是機關團體的官報公報，其次是民間的婚喪冠祭，或是法律事件等。

最後說到報紙最重要的編輯和採訪方面，大概以民國二十年爲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。

二十年前，四川各報的消息來源，本省靠

政府的公報，國內要聞有的在京滬一帶報館中，聘人兼理發電報和寫通訊，還沒有特派記者。本省本市的市政或社會新聞，還靠一些通訊社的新聞稿。據我們所知，當年成都大小通訊社林立，小的掛個招牌，就只有一個人。這批記者當年還被叫做「訪員」，油印新聞稿送給各報館，由編輯決定刊用，並且還分爲甲乙丙丁四級，在新聞稿後註明，以便月終結算付酬。

訪員在當年社會上，極爲一般人所歧視，認爲都是些無聊文人，招搖撞騙。其實社會上行行出狀元，行行也良莠不齊。訪員當中，的確份子複雜，少數敗類還抽鴉片煙，在四川公開營業的煙館中，捕風捉影，編些新聞；而且在社會新聞上，多半喜歡揭人隱私，屬於桃色新聞的最多。他們常用的形容詞句是「春風一度，珠胎暗結」，或是「紅杏出牆」、「陳倉暗渡」之類，我至今印象還很深刻。

民國二十年後有了改善。成渝各大報開始任用自己的記者，到各地方採訪；又在省外特聘比較專任的通訊員，在省內各要地、各縣城，也聘有專人負責通訊，要事打電報，普通寫通訊。像成都新新聞就以本省各地新聞迅速見長，爲讀者喜愛。但新聞來源的改善，另有重要的原因。

民國二十一年，在南京廣播電臺加強電力到七萬五千瓦特，全國可以收聽該臺轉播中央社的新聞稿。中央社又和外國各通訊社有契約，所以國內外消息，大部齊備。到民國二十四年，中央社派馮志翔在成都設立分社後，成都報界的新聞來源更加靈通詳盡，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在言論方面，自從二十三年中央勢力入川以後，各報的社論和短評等也愈發有力量，更加敢說話，不再顧忌軍頭們的壓迫，甚至被查封、抓人坐監牢等。像成都新新聞的短評「小鐵椎」——這一短欄的作者，姓名一時不能想起——在抗戰前已經馳譽遐邇，經常批評省政市政，最受

人歡迎，被認為是輿論的尖兵。各報也極為重視副刊，新舊文字作品，成為知識分子和市民的良伴。新新聞的副刊上有專欄刊載在蜀中「五老七賢」和文人學士的詩詞，更成為全川愛好此道人士的必讀品。

抗戰前，成都選出了一位怪文人劉師亮，創辦「師亮隨刊」，是屬於雜誌型的不定期刊物。內容有短評式的「親家對話」、詩詞、小說、燈謎、聯語之類；嘻笑怒罵，皆是文章。出版後風行全川，茶房酒肆，隨處聽到叫賣。後來他諷諷省主席劉文輝被查封；劉師亮遠走上海，遇上林

語堂，兩人頗成莫逆，因為彼此提倡「幽默」，志同道合，當年傳為文壇佳話。

人口衆多地形險固

總結而論，四川具有天賦的優勢條件。現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，前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上將在他的名著「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」中，曾有一段寫到四川成為「復興民族根據地」的史實：

「南京是政治中心。但在「一二八」淞滬抗戰期間，政府就有遷都準備。到民國二十四年，領袖入川督剿匪軍，見到四川民風樸實，物產豐饒，就選定四川為「復興民族根據地」，也就是抗戰基地。日軍若奪取南京，中國政治中心可以遷往四川，對於中央政府發號施令，無重大影響。」

再進一步看四川之所以成為「中華民族復興

根據地」，還有重要因素三項，一為人口衆多，一為地形險固，一為四川同胞熱愛國家民族，擁護中央政府，鞏固統一團結。清人顧祖禹在其名著「讀史方輿紀要」一書上，對四川的形勢說過：「以四川而爭衡天下，上之足以王，下之足以霸。」

尤其是三國時代的偉大政治家諸葛亮在隆中對策時，他對劉備說四川說得更透徹，更重要。他強調四川道：「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。」

古賢對四川的重視如此，所以蔣中正委員長當年親臨四川後，就選定四川為「中華民族復興根據地」。因為他早已斷定日本軍閥最後必全面侵略中國，抗日戰爭必然全面展開，必然是長期作戰。他也判定京滬、武漢之不可久恃，祇有四川才有充足而適合的條件，作為抗戰建國的基地了。

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守成 著
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台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。故鄉風物話射洪。教書生涯。金陵問學記。農政憶往。抗戰初期烽火行。川南風雲。做縣長經驗談。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。國民大會之回憶。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。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